

統萬城與赫連果城：試論兩個歷史遺蹟的涵義

劉翠溶*

本文原發表於「統萬城建城一千六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陝西省靖邊縣，2013年6月13~16日。收入侯甬堅等編，《統萬城建城一千六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5.12)，頁394-401。

統萬城位於今陝西省靖邊縣，赫連果城位於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都是大夏國(西元407-431)的遺蹟。由於個人對南北朝的歷史素無研究，這篇短文將試以最近閱讀的一些資料來討論這兩個歷史遺蹟的涵義。以下就先談統萬城，再談赫連果城。

據《晉書·赫連勃勃載記》，統萬城是赫連勃勃(381-425)在大夏鳳翔元年(413，晉安帝義熙九年)，命匠作大匠叱干阿利發嶺北夷夏十萬人，在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以統萬為名。赫連勃勃於宮殿大成後，赦其境內，又改元真興(419，晉恭帝元熙元年)。¹ 至於統萬城全部完成的時間，張永帥在2008年的研究指出，根據《資治通鑑·宋紀二》記載，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大夏真興六年)，赫連勃勃為四個城門命名，這一年才是統萬城完成的時間。² 統萬城是在既有的歷史基礎上興建，學者對此大致上沒有爭議；問題在於確切地點在何處？吳宏岐在2004年的研究指出，早在1973年侯仁之教授據北魏酈道元(?-527)《水經注》的記載，認為統萬城是在漢代奢延縣城基礎上改築的；王北辰教授在1983年的研究也持同樣的看法；但吳宏岐進一步指出，在既有的歷史基礎上，赫連勃勃增建的是西城的部分，主要為宮殿和苑囿。³ 張永帥在2008年提出另一種說法，認為統萬城是在漢代朔方縣城的基礎上興建的。⁴ 這個問題涉及的是古代地名的沿革及行政轄區歸屬的問題，在此就不細論。⁵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特聘講座。

¹ (清)吳士鑑、劉承幹，《晉書輯注》(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本)，卷130，載記30/8b, 15a。

² 張永帥，〈關於統萬城歷史的幾個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3卷第1輯(2008年1月)，頁98。另外，薛正昌，〈赫連勃勃與統萬城〉，《天水師範學院學報》，第23卷第4期(2003年8月)，認為城牆修好並命名南門為朝宋門應是420年以後的事，見54。

³ 吳宏岐，〈關於大夏國都統萬城的城市形態與內部布局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9卷第3輯(2004年3月)，頁129-131。以兩漢奢延縣城為基礎之說，亦見於薛正昌，〈赫連勃勃與統萬城〉，頁54。

⁴ 張永帥，〈關於統萬城歷史的幾個問題〉，頁99-101。查《漢書·地理志》，奢延縣屬於上郡，而上郡亦統於朔方刺史，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光緒庚子春月長沙王氏校刊本(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頁27a, 30b-31a。

⁵ 據王先謙補注說：「元和志以唐什賁故城為漢朔方縣，而云近在唐朔方縣理之北。不知漢之朔方在上郡北，與河北相近。唐之朔方縣在今榆林西南，本漢之上郡地。如元和志所言，則漢之朔方在今榆林邊內，而上郡轉在朔方之北矣，非是。」見《漢書補注》，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頁31a。如果王先謙的說法正確，則並不如張永帥所言，唐代的朔方縣也就是漢代的朔方縣。而是唐代朔方縣位於漢代的上郡，也就是奢延縣所在之地。至於靖邊縣之沿革，參見丁鉉修，白翰章纂，《靖邊縣志稿》，光緒二十五年鉛印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二九七號(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0)，卷一，頁80。

北魏太武帝在始光四年(427)滅赫連昌後，改統萬城為統萬鎮。後來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改置夏州，歷經隋、唐、五代，行政的歸屬雖時有更改，統萬城一直是個重要的軍事城鎮，到宋太宗時為了邊防，才在淳化五年(994)四月，詔令遷民廢城，統萬城乃漸淪為廢墟。⁶ 直到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何炳勛調查夏州城故址，於是統萬城遺址才重新受到重視。⁷

統萬城代表的意象，一方面如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袁林所說：「城之堅固與赫連勃勃之殘暴，成為歷史上的一個典型。」⁸ 另一方面，亦如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副教授楊滿忠所說：「統萬城是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文化積澱最多、最具有特殊意義的歷史文化古城。」⁹

在赫連勃勃建統萬城時，使用了十萬人的勞力，史書記載明確，似乎沒有爭議。但其工法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晉書》說：「阿利性尤工巧，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¹⁰ 所謂「蒸土」，很容易造成誤解。據袁林的研究指出：「對牆體實物進行化驗，以其富含碳酸鈣並聯繫到今天建築中利用石灰的情況，根據氧化鈣加水變為氫氧化鈣過程中產生大量熱能、引起水氣蒸騰的現有知識，推測築城時使用石灰，被人誤記為蒸土。」此外，袁林也指出，統萬城的馬面長且密，此種築城方法為赫連氏特長，被宋代沈括(1031-1095)認為深可為法。¹¹

赫連勃勃築城和征戰所需的經濟來源，已有一些論文就大夏國的經濟情況來加以說明。例如，王尚義和董靖保指出，大夏國的經濟來源主要有三方面：種植供給，牛羊供給，掠奪性供給。¹² 又如，吳洪琳追溯鐵弗匈奴自公元四世紀初至五世紀初建立大夏國，在朔方地區一直是以畜牧為主要生產，隨著大夏國勢力向南發展，攻佔了後秦等國許多領土，其統治區內農耕民族的人數也逐漸增多，於是社會經濟中也有了許多農業經濟的成分。不過，在大夏國境內從事農業生產的大多數是其他農業民族，如漢族、氐族、羌族等。至於弗匈奴的手工業，則主要是冶銅和冶鐵；冶銅主要是用於鑄幣及裝飾器，冶鐵主要是製造武器；官營的手工業有一定的規模和產量。皮革和木器加工也略有發展。鐵弗匈奴與河西地區也有商業往來。此外，他們在征戰中俘獲人口和財物，建立多座城邑。大夏國所築的城邑較為重視種植林木、果樹，無意中保護和改善了當時的生態環境。¹³

⁶ 王尚義、董靖保，〈統萬城的興廢與毛烏素沙地的變遷〉，《地理研究》第 20 卷第 3 期(2001 年 7 月)，頁 351。

⁷ 侯甬堅，〈道光年間夏州城故址(統萬城)的調查事由〉，《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第 4 期 (2003 年 7 月)，頁 87-94。

⁸ 袁林，〈論“歷史研究”－從統萬城實地考察談起〉，《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4 卷第 6 期(2005 年 11 月)，頁 19。

⁹ 楊滿忠，〈統萬城文化溯源〉，《寧夏師範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2 期(2007 年 3 月)，頁 89。

¹⁰ 吳士鑑、劉承幹，《晉書輯注》，卷 130，載記 30/9b。

¹¹ 袁林，〈論“歷史研究”－從統萬城實地考察談起〉，頁 19-20。

¹² 王尚義、董靖保，〈統萬城的興廢與毛烏素沙地的變遷〉，頁 349-350。

¹³ 吳洪琳，〈鐵弗匈奴對朔方地區的經營開發〉，《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學)》，第 30 卷第 1 期(2008 年 1 月)，頁 26-29；吳洪琳，〈鐵弗匈奴的社會經濟狀況〉，《西北民族論叢》第七輯(2010 年)，頁 66-83。另見楊帆，〈赫連夏手工業發展初探〉，《河北北方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胡玉春的研究則指出，赫連勃勃時期雖戰爭不斷，然而都是對外擴張的戰爭，並沒有波及到大夏國統治的中心地區，這為大夏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相對安定的環境。大夏國的物質文化是適應地區經濟交融而形成的農牧結合的文化，也是這一類型中成功的範例。胡玉春根據1975年以後的考古發現，在統萬城四垣的馬面中，有兩處戰備倉，裡面儲存有松、杉等木材和高粱等食物痕跡，這些證據顯示大夏國是非常重視農業生產的。¹⁴ 此外，胡玉春也提到，赫連勃勃時曾鑄「大夏真興」錢，但據楊魯安的研究，「大夏真興」錢是一種「賞賜錢」，不是一般流通的貨幣。¹⁵ 另據范麗敏的研究，赫連昌時的「承光」錢應是流通的貨幣。貨幣的流通證明大夏國有一定的經濟實力。¹⁶

至於統萬城的興廢與環境的關係，也已有不少研究。例如，史念海教授據他在1972年考察黃土高原的觀察指出：當年赫連勃勃選擇建都地點時，曾經說，他到過許多地方，自大河以南，馬嶺以北，沒有見到過像這樣好的地方！赫連勃勃所說的主要是鄂爾多斯高原及其周圍的地方。統萬城位於鄂爾多斯高原的南緣，宜其最為佳勝。但統萬城西距毛烏素沙漠不遠，沙漠向東擴展，就不能不受到影響。唐代後期，設于統萬城遺址的夏州就已見到飛沙，其後日甚一日，統萬城終於為沙漠所掩沒，夏州也不能不因而廢棄。¹⁷

袁林在2004年的研究中，比較唐宋時期夏州與全國的人口密度，指出唐宋時期夏州人口密度顯然在環境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因此，他認為「人類過度開發導致統萬城周圍地區環境惡化的觀點」，應當重新推敲。¹⁸ 王尚義等人在2005年5月考察統萬城，認為在赫連勃勃統治時期，毛烏素地區的農業生產有一定的規模，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河谷地帶和階地、灘地上，作物類型主要以秋糧為主。統萬城遺址發掘有大量高粱米的儲存便可說明這一點。可以說在赫連勃勃主政前後，毛烏素地區是畜牧水草環境，在河流谷地有一定的農耕生產，在河湖乾涸的地方有湖相沉積沙地，但並未形成流動的沙地和沙的環境。統萬城建築完成，歷經北魏、隋、唐、五代，至宋初，一直不失為毛烏素地區的重要軍事城鎮，到宋太宗淳化五年(994)詔令廢城。此後，人為因素增加，毛烏素地區畜牧條件超出負荷承載，農墾區逐漸擴大，人口直線增加，毛烏素沙區環境隨之形成。因此，統萬城的興衰既有政治軍事的需要，也有自然環境演化的原因，而統萬城政治地位的變化，其農牧業比重與規模的變化，以及其人口的多少，也都影響到毛烏素地區環境的變遷。¹⁹

此外，鄧輝等人運用大比例尺航空遙感影像判讀、歷史文獻分析和實地考

第 28 卷第 5 期(2012 年 10 月)，頁 66-69。

¹⁴ 胡玉春，〈大夏鐵弗匈奴社會經濟狀況探析〉，《蘭州學刊》，2010 年第 3 期(總 198 期)，頁 4-8。

¹⁵ 楊魯安，〈大夏真興錢考〉，《內蒙古金融研究》，2003 年 S2 期，頁 50-64。

¹⁶ 范麗敏，〈大夏國經濟發展水平估測〉，《集寧師專學報》，第 32 卷第 3 期(2010 年 9 月)，頁 65。

¹⁷ 史念海，〈黃土高原考察瑣記〉，《中國歷史地理論叢》，No. 3 (1999)，頁 10。

¹⁸ 袁林，〈從人口狀況看統萬城周圍環境的歷史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 19 卷第 3 輯(2004 年 9 月)，頁 144-148。

¹⁹ 王尚義、董靖保，〈統萬城的興廢與毛烏素沙地的變遷〉，頁 349-352。

察等多種方法，在復原統方城的城市形態的基礎上，對建城初期當地的生態環境做了一些初步的復原工作，並探討了統方城修建到廢毀期間人類活動對當地環境的影響過程。他們引用最新的第四紀環境研究報告說，毛烏素沙地的形成至少可上推至晚更新世距今約15萬年的時候。從位於統萬城西部、無定河上游的米溝灣地層剖面分析結果，15萬年以來毛烏素地區經歷了27個沙漠的堆積時期，同時也經歷了取代沙漠沉積的27個河湖沼澤和古土壤發育的時期。尤其是在全新世的一萬年內，這種沙漠期、間沙漠期的變化共發生了5次。在沙漠期，氣候條件較差，沙地範圍擴大；在間沙漠期，氣候條件較好，沙地面積縮小，而湖泊與草甸的面積擴大。因此，無論是在沙漠期，還是在間沙漠期，毛烏素沙地內部都是同時存在沙地、湖泊、草甸、草原等生態景觀類型。沙漠期或間沙漠期，在空間上反映的是這些生態景觀類型比例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在歷史時期，這種沙漠期或間沙漠期的生態景觀類型的自然演變過程中，又疊加了人類活動的強烈影響。²⁰ 另外，王煒林就考古學的角度加以觀察，他認為：「毛烏素沙漠正是天災與人禍的混血兒，只不過我們現在還說不清是什麼因素在促使這個怪胎的誕生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而已。」²¹ 要之，就15萬年來毛烏素沙漠長久演變的過程來看，統萬城興廢所呈現的不過是自然與人為因素互動結果的一小片段而已。

附帶一提的是，儘管統萬城曾被廢棄，但其附近地區的經濟生產活動，可能一直是以農牧業為主，例如，清末纂修的《靖邊縣志稿》就說：「邑人業農者多，工商寥寥，油房客棧外，絕鮮經營。沿邊近蒙古一帶利於畜牧。」農產品除穀類外，也有多種瓜果。²²

至於赫連果城，它建立的確切時間不詳。據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說：「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桑果餘林，仍列洲上。但語出戎方，不究城名。訪諸耆舊，咸言故老宿彥云，赫連之世，有駿馬死此，取馬色以為邑號，故目城為白口騶韻之謬，遂仍今稱，所未詳也。」²³ 另據《魏書·地形志》，薄骨律鎮設於北魏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後來在北魏孝明帝孝昌(525-527)中改為靈州。²⁴ 可見「赫連果城」是後人就其地景特色給予的稱呼。

薄骨律鎮的歷史可上溯到漢代的靈州。據《漢書·地理志》，「靈州，惠帝四年(西元前191)置，有河奇苑、號非苑。」唐顏師古(581-645)注云：「苑謂馬牧也，水中可居者曰州。此地之在河之州，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州。」清王先謙(1842-1917)補注說：「正文及注州字，官本作洲。」至於後來的文獻，則都作「靈

²⁰ 鄧輝、夏正楷、王瑋瑜，〈從統萬城的興廢看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脆弱地區的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6卷第2輯(2001年6月)，頁104-113。

²¹ 王煒林，〈毛烏素沙漠化年代問題之考古學觀察〉，《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5期，頁80-85；這篇論文也引用了最新的第四紀環境研究報告。

²² 丁錫奎修，白翰章纂，《靖邊縣志稿》，卷一，頁113-114。

²³ (魏)酈道元，《水經注》，收入《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94冊(臺北：世界書局，1986-1988)，卷三/1b-2a。參見吳洪琳，〈鐵弗匈奴對朔方地區的經營開發〉，《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學版)》，第30卷第1期(2008年1月)，頁27。

²⁴ (齊)魏收撰，《魏書》(臺北：藝文印書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卷106上，地形二上/43a。

洲」。²⁵ 由此可知，赫連果城所在地原是漢代的靈州(洲)，是牧馬的場所，在赫連勃勃時期種了很多果樹。²⁶ 它代表的是唐代詩人韋蟾(?-873)所說的「塞北江南」的意象。²⁷

北魏在436年置薄骨律鎮時，薄骨律鎮可能並沒有城牆。據《魏書·刁雍傳》記載，刁雍(390-484)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奉派為薄骨律鎮將。他在太平真君九年(448)上表建議，為了防守禦敵，應「造城儲穀，置兵守備」，至十年(449)三月城成。太武帝下詔名此城為「刁公城」，以旌表他的功勞。²⁸ 由此可知，所謂「赫連果城」在大夏國時代並沒有築城，而這個「刁公城」應是後來靈州城的前身。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築城之外，刁雍抵達薄骨律鎮後，最先做的事是上表建議開鑿新渠。他觀察到原有的古代舊渠，「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渠既高懸，水不得上。」於是他在艾山之下開鑿新渠，可「溉官私田四萬餘頃」。這項工程完成後，深得太武帝的嘉許，要他多多報告便國利民的事。²⁹ 據李令福的研究，除了指出「四萬餘頃」可能是四千餘頃之誤以外，艾山渠的歷史意義至少有三：(一)刁雍對前代舊渠的調查留下確切的資料，填補了兩漢時代銀川平原水利建設的空白；(二)艾山渠的修建成功促使北魏時期銀川平原水利建設的發展；(三)艾山渠做為少數民族政權興修水利工程的傑出代表，奠定了銀川平原成為「塞北江南」的基礎。³⁰

至於韋蟾詩中的「塞北江南」所指的地區，精確的說，據張樹彬的研究是指吳忠平原，不是指銀川平原。張樹彬也提到，北周時遷至靈州的江南人帶來了江南的灌溉技術，同時也帶來了江南的民俗風俗；而這是當時的銀川平原所不具備的。在明代，黃河屬於「不安流」期，地處河渚上的古靈州城被河水沖激崩圮，幾遷其址。自2003年以來，吳忠市大量唐代文物出土，學者考證確認吳忠即是唐代靈州遺址。³¹

另外，王培華的研究把「塞北江南」之稱呼追溯到隋煬帝大業四年(608)郎茂(541-615)撰修的《隋州郡圖經》，據其記載，北周宣帝宣政二年(579)，亦即陳宣帝太建十一年，「破陳將吳明徹，遷其人于靈州。江左之人，崇禮好學，習俗皆化，因謂之塞北江南。」此外，唐李吉甫(758-814)的《元和郡縣志》說靈州

²⁵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頁 23b。楊芳燦、郭楷等纂修，《靈州志蹟》，嘉慶三年(1798)抄本，收入《中國方志叢書》，塞北地方，第四號(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68)，卷一歷代沿革，頁 24-25。另參見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靈武文史資料》第一輯(靈武縣印刷廠，1989年6月)，頁 1-8。

²⁶ 漢代靈州的苑，雖是馬牧，是否也可能也種了果樹，值得推敲。例如，清代的南苑就設有果園；見清高宗敕撰，《欽定八旗通志》(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卷 68，頁 4a-b。

²⁷ 見張樹彬，〈“塞北江南”在何方〉，《寧夏史志》，2006年第01期，頁 41-43。這篇文章分析唐代詩人韋蟾的詩〈送盧潘尚書之靈武〉：「賀蘭山下果園城，塞北江南舊有名。……」並指出，塞北江南所指的不是銀川平原，而是今日的吳忠平原。

²⁸ (齊)魏收撰，《魏書》，卷 38，頁 5a-b。

²⁹ (齊)魏收撰，《魏書》，卷 38，頁 3a-4b。

³⁰ 關於刁雍開鑿新渠的研究，詳見李令福，〈論北魏艾山渠的引水技術與經濟效益〉，www.agri-history.net/organizations/6eaamlf.htm，2013年3月16日查詢。

³¹ 張樹彬，〈“塞北江南”在何方〉，頁 41-43。

「其城，赫連勃勃所置果園，今桃李千餘株，郁然猶在。」而韋蟾的詩，則進一步使「塞北江南」之說播傳得更為久遠。因此，王培華認為，「塞北江南」涵蓋的地理範圍，在隋唐時只包括靈州及其附近，到明朝則擴大到整個寧夏地區。³²

值得注意的是，新編的《靈武市志》引述北周打敗陳將吳明徹的史事來陳述寧夏自古以來有「塞北江南」之稱。³³《吳忠市志》也提到「塞北江南」的由來及歷代這個地區在農牧生產方面的具體表現。³⁴ 這些最近的記述也都顯示，「赫連果城」的歷史意象透過「塞北江南」而傳得更久更廣。

綜上所述，統萬城做為一個政治軍事城鎮的五百餘年中，它除了扮演政治、軍事的角色外，其興廢也反映著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交互作用的歷程。至於赫連果城，則透過後來出現的「塞北江南」意象，反映了歷來生活在古靈州地區的人們如何利用當地的自然環境從事生產。此外，統萬城與赫連果城這兩個歷史遺蹟也都具有中國歷史上民族交融的涵義。

The Tongwan City and the Helian Orchard City: An explorat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wo historical sites

Ts'ui-jung Liu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ongwan City and the Helian Orchard City, the two historical sites of the Daxia Kingdom (407-431). Recent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history of Tongwan City from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the time of its constructio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supporting its construction, its role as a military post,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factors related to its abandonment. Regarding the Helian Orchard City, studies have tried to clarify the location related to the metaphor of "Saibei Jiangnan" (literary, the Jiangnan scenery in the area north of the Great Wall), the term became popular since the ninth century, and how local residents in that area utilized the favorable natural environment for supporting their livelihood. More significantly, both the Tongwan City and the Helian Orchard City have an implication of blendi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Chinese history.

³² 王培華，〈寧夏“塞北江南”之稱由來考〉，《社會科學戰綫》，2008年第7期，頁104-112。據(唐)姚思廉(撰)，《陳書》，(臺北：藝文印書館據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吳明徹傳，敘述這次戰役的經過，並說吳明徹就執後，「尋以憂憤邁疾，卒於長安。」並未說遷其人於靈州。見卷九，頁11b-12a。另據(唐)令狐德棻等(撰)，《周書》(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王軌傳，敘述他如何打敗吳明徹，「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並器械輜重並就俘獲。」也未說遷移這些人至靈州。見卷四十，頁3b-4a。無論如何，這一次戰役涉及的人口遷移問題，以及中國歷史上移民西北的問題，也值得進一步仔細研究。

³³ 靈武市志編纂委員會(編)，《靈武市志》(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頁5。

³⁴ 利通地區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吳忠市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4，頁266-267。